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第二辑） 黄俊杰 主编

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 互动、转化与融合



黄俊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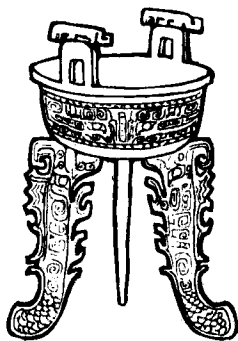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第二辑)

黄俊杰 主编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 互动、转化与融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
黄俊杰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7-8473-0

I. ①东… II. ①黄… III. ①儒家—研究—东亚
IV. ①B222.05②B3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1511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0-698 号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

著 者 黄俊杰
组稿编辑 龚海燕
项目编辑 宋坚之
审读编辑 陈庆生
责任校对 汤 定
装帧设计 黄惠敬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o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9
字 数 13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2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8473-0/B·618
定 价 2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儒学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十余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两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审查通过后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一百五十余种,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东亚儒学研究丛书”、“东亚儒学研究资料丛书”、“全球在地视野丛书”等六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儒学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

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发展。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儒学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十余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东亚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简体字版的出版与发行,在 2008 年推出丛书第一辑 32 册之后,又积极筹备出版第二辑 10 册。相信这项出版工作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东亚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黄俊傑

谨识

2011 年 11 月 28 日

于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

自序*



这部书所探讨的是在东亚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中,儒家经典及其价值理念与日本及朝鲜之地域性特质的互动、冲突或融合之问题,尤其聚焦于儒家经典的阅读者之“自我”与“他者”之互动,以及经典中的知识与东亚各国权力结构之互动。本书原是我执行“国科会研究计划”(NSC 95-2414-H002-028-MY3,2006年8月1日至2009年7月31日)之主要成果,经大幅改写而成。我想先说明本书之问题意识及写作构想。

本书之问题意识从东亚出发思考,实系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人文研究之新动向为其宏观之学术背景。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向正隐然形成之中。这股新动向主要是由于“全球化”潮流与亚洲的崛起这两大力量的相激相荡所造成。“全球化”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并身处其中的潮流,而亚洲的兴起不仅是因为在亚洲历史上出现如儒学、佛教、道家、神道等伟大的精神传统与宗教信仰,出现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中国传统医学等文化遗产,出现影响深远的律令制等政治制度,更是因为最近十余年来亚洲地区的快速崛起,《东洋经济周刊》曾统计:自1996年至2005年的十年之间,亚洲各国之间的航空旅客增长率是109%,远超过全球跨洲的平均增长率60%、亚洲与北美

* 本文写于2010年2月4日立春。初稿部分文字曾刊于《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讯》,第3卷第3期(2008年9月)。

间的 67%、亚洲与欧洲之间的 59%，以及欧洲各国之间的 36%。^① 而且，全球各地人口超过千万的十九个大城市中，有十一个在亚洲。亚洲的崛起应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可以预期的新趋势。在亚洲地区勇猛发展之际，东亚地区的人文学术研究迫切地需要新的取向与新的视野。

但是，回顾二十世纪东亚各国的人文研究趋势，固然个别学者或研究机构有其精深扎实的学术成就，但是就其大趋势而言，常常出现两种明显的倾向：

第一，二十世纪东亚人文学术界许多著作常以西方经验作为研究时的参考架构，以东亚经验印证西方学术理论。例如，二十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史学者侯外庐(1903—1987)宣称他“主张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从一般的意义上言，这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从引申发展上言，这是氏族、财产、国家诸问题的中国版延长”。^② 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确实是企图以中国历史经验作为马克思(Karl Marx, 1818 - 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 - 1895)理论的亚洲版本之注脚。

第二，二十世纪东亚各国学者人文研究的视野常以自己国家为中心，较少采取跨国或跨界之视野，因此，较少或难以提出具有普遍意义之命题。二十世纪中、日、韩各国的文史哲研究论著，呈现相当明显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族论述”。

以上这两大问题常交互作用并互为因果，所以流弊所及，使东亚学术界的潜力难以发挥，正如张光直(1931—2001)在 1994 年所说：“中国人每个人都有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本钱。研究的资料，则有一部二十四史，……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上，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作一般性贡献的潜力完全不能发挥？”^③ 张光直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因应以上所说二十世纪东亚人文学术研究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新时代里，我认为东亚人文研究可以采取以下三种研究取向：

① 转引自张汉宜、辜树仁：《全球航空争霸战，亚洲占鳌头》，《天下杂志》，第 378 期(2007 年 8 月 15 日)，页 108—109。

②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上海：中国学术研究所，1948 年)，《自序》。

③ 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亚洲周刊》(香港)，第 8 卷第 27 期(1994 年 7 月 10 日)，页 64。

第一,聚焦东亚经验,从东亚出发思考。事实上,跨出国家疆域而以东亚作为研究之范围,正是二十一世纪人文研究的新动向。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兴起,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东亚人文学界开始从二十世纪常见的“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格局,逐渐转而以东亚为研究的视野。举例言之,日本东京大学原有的“中国哲学”讲座,就更名为“东亚思想文化学”讲座。日本各大学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资助的卓越研究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简称COE)计划,也大多以东亚为视野。南韩政府所推动的“二十一世纪韩国头脑”(Brain Korea 21st Century)卓越计划(简称BK21),在人文学科方面的计划也是以东亚为研究范围。台湾自2000年开始所推动的两梯次卓越研究计划,也都是以广义的东亚文化范围作为研究领域,如“东亚儒学”、“东亚民主”、“华人心理学”等计划,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所属创始计划如“东亚经典”、“东亚民主”、“东亚法治”、“全球化”研究计划以及后来的“华人的观点与我观”与“生产力与效率:从东亚走向全球化”等研究计划(在2006—2010年执行),均在不同领域与程度上说明了二十一世纪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新取向。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必然具有跨文化的、跨国界的、跨学科的、多语言的多重视野。这种学术社群必然是管弦呕哑、众声喧哗的,是“万山不许一溪奔”的学术社群。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我在此所谓“聚焦东亚经验”,实系有感于我们愈深入东亚历史与文化经验,就愈能开发其全球性之意涵,而“从东亚出发思考”,正是建立具有普世性的学术命题的重要起点。

第二,以经典或价值理念为研究之核心。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基础,这种状况固然与清代朴学的学术传统有关,也与二十世纪初年欧陆实证主义思潮相激荡。在实证主义风潮之下,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研究论著,关怀“事实”问题远过于“价值”问题。

但是,问题是:“事实”如果不是置于“价值”的脉络中加以衡量,那么,“事实”的意义多半难以彰显。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人文研究,除了过去所注重的“事实”问题之外,更应加强有关“价值”问题的研究,尤其是承载价值理念的经典,更应成为人文研究的核心。

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

第三,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我虽然强调以“从东亚出发思考”作为新时代人文研究的策略,但我们也必须注意东亚各国历史经验与人文传统中的“同”中之“异”。只有深入具体而特殊的而且具有地域特色的个别文化脉络,我们才能开发并拓展全球的视野,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3-2006)所谓“具有全球意义的地域知识”,正是指此而言。

东亚各国固然都分享汉字文化、儒家价值理念、佛教信仰、传统中国医学等共同的文化质素,但是,中、日、韩、越各国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差异,也不容我们忽视。例如,作为儒家价值承载者的儒家学者,宋代以后的中国是士大夫阶级,与朝鲜时代(1392—1910)朝鲜社会的“两班”阶级不同,也与德川时代(1603—1868)日本的儒者只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各自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大不相同。

因此,如果我们能将东亚文化的共同质素,放在各国具体而特殊的文化脉络中加以分析,就更能避免“去脉络化”的弊病,而使研究对象的发展历程更具有实体感,也更具有厚度。

随着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中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解疆域化”,以及“区域经济”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协10+1”、大中华经济圈等经济体的兴起,人文研究势必形成新的取向。二十一世纪人文研究策略,如果采取“从东亚出发思考”、“以经典或价值理念为研究之核心”,并“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的研究策略,就可以开展许多新的研究的可能性。

在上述二十一世纪新学术视野之下,本书各章文字中所谓“东亚儒学”这个研究领域虽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的儒学传统,但是它并不是东亚各地所呈现的不同版本的儒学拼凑而成的“马赛克”(mosaic)。“东亚儒学”的视野超越国家的疆界,它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因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

本书将东亚儒学经典及其价值理念,置于中、日、韩各地的文化脉络中加以考察,分析源起于中国的儒家经典及其核心价值与各地地域特质的互动。

本书既以东亚为视野,主张“从东亚出发思考”,因此,首先必须就“东亚文化交流史”这个新学术领域有所探索,本书第一章《作为区域史的东亚文化交流史:问题意识与研究主题》就分析“东亚文化交流史”领域中之问题意识及其研究主题,作为本书之《导论》。

本书第二部分《“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包括第二、第三、第四共三章,探讨在东亚周边地区如日、韩等地的儒者,解释中国儒家经典时,常常体验中国儒家经典中的“普世价值”与“地域特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与“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张力关系。本书第三章比较十八世纪中、日、韩儒学思潮的同调与异趣,第四章以中国经典中常见的特殊词称“中国”这个概念为中心,分析“中国”概念在近世日本与现代中国台湾的转化。

接着,本书第三部分《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包括两章,第五章研究东亚儒者解经之途径及其问题,指出在东亚儒学解经传统之中,“体知”是一种手段,而“体现”才是读经之目的;东亚儒学读经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在于对经典进行知识论意义的“理解”,而是将经典中的价值理念含纳到自己的身心,使自己的生命受到经典的价值理念的浸润与转化。所以,东亚解经传统中的“体知”这个课题,是东亚儒家诠释学中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与当代文化人类学与戏剧学中的“embodiment”这个课题,可以互相发明,开发东亚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第六章特别注意到经典解释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两者之间一方面既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又互为紧张;两者在相互竞争中既互相渗透又互相转化。展现具有东亚文化特色的经典解释学。

总而言之,随着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的转变,将儒家传统置于东亚文化交流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并衡断其价值,是新时代人文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值得努力以赴。本书是我自己在这个新领域探索的初步成果,谨以虔敬之心,献给有心于“东亚儒学”研究的同行学者,并期待读者诸君子的教正。

目 录

自序	1
----------	---

导 论

第一章 作为区域史的东亚文化交流史

——问题意识与研究主题	3
一 引言	3
二 方法论的思考	6
三 问题意识	17
四 研究主题	21
五 结论	24

“自我”与“他者”的互动

第二章 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自我”与“他者”的互动

——类型及其涵义	29
一 引言	29
二 类型一：“政治自我”与“文化自我”的张力	30
三 类型二：“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	34
四 类型三：“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	36

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

五 类型四：“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	38
六 结论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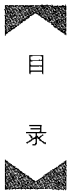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十八世纪东亚儒者的思想世界	44
一 引言	44
二 十八世纪东亚儒学的同调(一):通过反朱子学而反形上学	44
三 十八世纪东亚儒学的同调(二):在“存在”中探索“本质”	50
四 十八世纪东亚儒学的异趣:中、日、韩儒者主体意识的比较	52
五 结论	58

第四章 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与现 代台湾地区的转化	60
一 引言	60
二 “中国”作为中国的“自我形象”：“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 的合一	60
三 近世日本世界观中“中国”概念的重构	62
四 现代台湾地区世界观中的“中国”：“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 的合一与撕裂	65
五 结论	67

知识与权力的互动

第五章 论东亚儒者理解经典的途径及其方法论问题	71
一 引言	71
二 作为体验的东亚儒者解经途径	72
三 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的方法论问题	79

四 结论	83
 第六章 论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与政治权力之关系	
——以《论语》、《孟子》为例	86
一 引言	86
二 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与权力的支配	87
三 东亚儒家经典的政治性解读	92
四 结论	97



结 论

第七章 结论	101
引用书目	104
外文人名索引	123
中文人名索引	126

【 导 论 】

第一章 作为区域史的东亚文化交流史

——问题意识与研究主题

一 引 言

本书探讨儒家经典及其理念在东亚的发展,因此必须首先就“东亚文化交流史”这个历史研究领域进行宏观的考察,以提供全书的背景知识。历史学家从搜集史料到撰写史著的研究过程中,最常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历史研究的范围与视野应以国家、地区或世界为主?扣紧这个问题来看,“国别史”(national history)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通贯整个十九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尤其是上半叶)各国的历史学家多半以国家(尤其是自己的国家)作为研究单位,“国别史”研究是二十世纪史学研究的主要潮流,以国族论述作为主题,以政治的或文化的民族主义作为价值论的基础。^①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研究为例,钱穆(宾四,1895—1990)的《国史

① 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以 Chris Lorenz 及 Stefan Berger 等人为首的团队,在2003年至2008年执行一项大型研究计划:“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ies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NHIST—www.uni-leipzig.de/zhsesf)。这项以研究十九与二十世纪欧洲的国别史写作为目标的研究计划成果,于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的“Religion, Nation, Europe and Empire: Historians and Spatial Identities”圆桌讨论会上发表,随后将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公司出版六卷本丛书及十本专书。

大纲》就是一部最具代表性的“国别史”的经典著作。^①但是,正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 - 1984)在 1979 年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国史学家对二战以前盛行的民族主义史学逐渐感到厌恶,欧洲史学家普遍认为民族主义史学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思想根源之一。^②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之中,“国别史”研究的合理性逐渐受到质疑。虽然亚洲各国在近百年来由于经历被侵略、被殖民的历史苦难,常以本国历史研究召唤国魂以抵御外侮,所以亚洲史学界的“国别史”研究仍然居于主流,^③但战后日本对 1945 年以前以国族论述与爱国情操为意识形态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确有所反省。战后日本历史学基本上可说是从民族主义史学走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史学研究。^④

相对于二十世纪盛行的“国别史”研究而言,“全球史”(global history)研究从二十一世纪开始受到许多史学家的重视。最近伊格斯(Georg G. Iggers, 1926 -)与王晴佳(1957 -)回顾 1990 年代至今历史学研究的趋势,就指出五个新动向:^⑤(1)文化转向与语言转向蔚为“新文化史”;(2)女性史与性别史的壮大;(3)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之下,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再

① 黄俊杰:《钱宾四史学中的“国史”观:内涵、方法与意义》,《台大历史学报》,第 26 期(2002 年 12 月),页 1—37;Chun-chieh Huang, “Historical Thinking as a Form of New Humanism for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Qian Mu's View of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Orientations in Historiography: Regional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3 - 5, Nov., 2007).

② 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p. 149. 关于二十世纪史学研究的回顾,可参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及 *Daedalus* (Spring, 1971): “The Historians and the Worl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③ 最近关于亚洲史学界的整体回顾,参考 Masayuki Sato (佐藤正幸, 1947 -), “East Asian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Pergamon Press, 2002), pp. 6776 - 6782.

④ 参看〔日〕远山茂树:《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東京:岩波書店, 1968 年)。

⑤ Georg G. Iggers and Q. Edward Wang, “The Globalization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Characteristic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Orientations in Historiography: Regional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